

诗经二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姚小鸥 著



高山，大王荒之。被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卷二 礼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诗经三颂与先秦 礼乐文化

姚小鸥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姚小鸥著.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

ISBN 7-81004-865-1

I. 诗… II. 姚…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中国
②礼乐-文化-研究-中国-先秦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131 号

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作 者: 姚小鸥

封面设计: 恒真设计公司

责任编辑: 理 石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81004-865-1 / K·19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一

夏传才

姚小鸥同志是我近几年结识的勤奋治学的中青年博士之一。他的生活道路并不顺畅，但挫折没有消磨他的意志。他不堕流俗，在艰难的境遇中坚持治学。这种精神，我自觉十分亲近，乃为忘年交。他在学术论争中的滔滔辩才，认真精神和可爱的锐气，其真诚的赤子之心，则是我所不及的了。

小鸥先后受业于华钟彦、杨公骥两先生，兼得张松如先生点拨，授自名师，学养颇有根基。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而完成的。我读过书中的大部分章节，认为他继承了华、杨二公的衣钵，加上他的勤奋与钻研，在他研究的这个课题上有所前进，有所丰富，有所突破。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以礼乐文化为背景来研究三《颂》，这个选题是把握准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三《颂》的价值未能作全面的评价，认为“《颂》诗拍马”，是“奴隶主贵族歌功颂德之作”，以致几十年来很少有人研究三《颂》。近年来这个情况已有所改变，小鸥的这本书，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小鸥的这本书透露着一股锐气，他有所师承，又不囿于成说，力图有发现，有进展，这种治学精神是可贵的，所以乐于为序如上。

2000年1月于思无邪斋

序 二

李炳海

在《诗经》各类作品中，三《颂》的解读难度最大。和《国风》、《大雅》、《小雅》相比，研究三《颂》的专门论著要少得多。然而，姚小鸥博士却对《诗经》三《颂》情有独钟，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就把它作为自己论文的选题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博士生毕业之后，他乐此不疲，继续这方面的思索、笔耕。如今，他的专著《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即将出版，这虽然只是小鸥博士宏伟研究计划中所完成的一小部分，但是，其中所涉及的论题，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已经相当可观，值得认真一读。

三《颂》的解读难度，不仅在于它文字古奥，而且还在于众多诗篇创作年代不明，用于祭祀的背景模糊，所属乐章没有定论。因此，对《诗经》三《颂》的研究，必须在思维中作好历史还原工作，采用学术界所说的原生态的把握方式。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完全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把历史百分之百地通过思维加以还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却不妨把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作为一种学术理想而树立起来，用以激励自己朝着这个目标日益趋近，使学术研究成为人类认识绝对真理活动的一部分。小鸥博士的这部专著，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原生态把握方式进行研究的结晶，是复原《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关系的有益尝试。

《诗经》三《颂》指的是《商颂》、《周颂》和《鲁颂》（在今

本《诗经》中，其排列顺序是《周颂》、《鲁颂》和《商颂》），它们分别作于殷商、周代和春秋时期。既然认定它们都是先秦礼乐文化的产物，这就把先秦礼乐文化上溯至殷商时期，下推至春秋阶段，时间跨度长达千年。周诗和礼乐文化的密切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公认的历史事实。鲁国作为礼义之邦，它的宗庙歌诗受祭祀文化的浸润，也没有什么疑义。至于殷商的祭祀歌诗和先秦礼乐文化是否有关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过一些反复，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殷商王朝是否与礼乐文化有缘分的问题。

殷商王朝和礼乐文化的关联，本来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就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前后相继，周礼有从殷礼那里获取的营养，殷代曾经有过比较发达的礼乐文化。殷礼是在夏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又对殷礼有所吸纳，由此而来，周礼实际上是融汇夏礼、殷礼而形成的。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就把礼乐文化视为在夏、商、周三代连续发展的链条。

在孔子那里，周礼是继承夏礼、殷礼而来，夏、商、周三代都存在可供借鉴、能为后世垂范的礼乐文化，这是他非常明确的理念。孔子本人还亲自到夏、商后裔所统治的杞、宋两国寻访前朝故礼，但仅见到《夏小正》一类的历书和有关阴阳学说方面的典籍。尽管和他期望的相距甚远，但毕竟还是有所获，他没有对夏礼、殷礼的存在产生怀疑。到了儒家后学那里，夏、商两代与礼乐文化是否有关联的问题，就不再有孔子说得那样确切，有时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结论。即以《礼记》一书为例，《礼运》、《郊特牲》、《明堂位》诸篇，相继提到夏、商、周三代之礼，甚至追溯到更远的原始时代，还提到鲁国之礼，和孔子对礼乐文化的看法一脉相承。可是，《表记》篇又写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按照这种说法，夏代无礼乐文化可言，殷人把鬼神置于礼之前，礼乐文化存在，却得不到重视，处于附属地位。只是到了周代，礼乐文化才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治理国家、协调人神关系的纲纪。上面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礼乐文化发展的轨迹，但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礼乐文化是周代的专利，和夏、商两代关系不大。提起礼乐文化，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周代，而忽视夏、商两朝的作用。至于鲁国的礼乐文化，人们更多地是将其和周公、孔子联系在一起，很少再考虑其他人物和其他方面的因素。

进入 20 世纪，对于三代礼乐文化的研究一度有所突破，王国维先生等一批学者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但是，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对殷商社会的讨论集中在奴隶制问题，兴奋中心是人性、人殉等和阶级压迫相关的事象上。既然人性、人殉都作为血淋淋的阶级压迫的写照而一再公诸于世，因此，殷商社会是否还有礼乐文化的问题，无形中成了学术禁区，许多人视为畏途，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些颇有造诣的文学史专家，也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当他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殷商社会时，发现那里存在众多的礼乐文化因素，有些还相当发达；当他们用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学眼光去观察殷商社会时，见到的都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血腥屠杀、象征暴力的神灵，礼乐文化则似乎难以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国内学术界对上古文化的研究也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国家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说是上古文化研究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周代礼乐文化与夏、商两代文化的联系重新得到确认，对殷商礼乐文化的研究也摆脱了以往尴尬的处境，可以纵横驰骋，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从孔子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周礼与前代文化的渊源关系。经历一系列的反复周折之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了孔子所确定的起点，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圆圈，既是向认识起点的回归，又是对先秦礼乐文化的重新还原。不过，如果不是停留于表面现象，而是对当前的先秦礼乐文化研究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方面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而是一个螺旋式的推进过程，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小鸥博士的这部专著是在当代学术大潮中产生的，是学术界在经历偏执、困惑之后，为还原上古文化以本来面目所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体现出新一代学人的风采。

原生态的把握方式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然而，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思维和论著中还原出来，需要有坚实的证据，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小鸥博士的这部专著，在礼乐故实的考证方面颇见功力。他以确凿的事实论证殷商礼乐文化对后代的熏陶浸润，不但周礼中有殷商礼乐文化的因子，鲁礼中也可以见到殷商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商颂·殷武》的增益改写，也明显受到周代礼乐文化的影响。他从色彩崇尚、万舞的运用等多方面把周、鲁礼乐文化与殷商文化相沟通，得出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令人信服的。本书的作者在论述三种文化关系时，不是按照单向输出和接纳的思维模式进行考察，而是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双向互动；不但作纵向的、历时性的梳理，而且有横向的、共时性的考察。对于各个时期的礼乐文化，他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加以动态的把握，从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审视。他把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概括为先武后文的过程，并对“德”这一概念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它在早期并不是专指文治，而是包括事典武功。对于《鲁颂》产生的文化背景，把它置于礼崩乐坏之际而又作礼乐中兴努力的复杂条件下加以考察，从鲁国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进行探索，从而对于鲁僖公这位国君、对于泮宫的形制、功能等颇为棘手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其中有些角度是容易被人

忽视的。这部著作是从礼乐文化入手去研究三《颂》，因此，必须以相关的礼乐典籍文献为依据进行考证辨析，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显示出扎实的功底，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还是礼仪的细节，以及车马仪仗、器具服饰，作者均能以相关记载为参照，斟酌古今各家之说，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本书除正文许多精彩的考证文字外，所附录的几篇论文也都探幽烛微，使先秦礼乐文化的几个疑案得以澄清。

这部著作的前身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文学方向，这样一来，探讨三《颂》的价值，就必然涉及到作品本身的解读问题，要对三《颂》给予准确的文学定位。三《颂》都是用于宗庙朝廷的祭祀歌诗，流传年代既久，有许多和祭祀相关的问题已经变得恍惚迷离，模糊不清。小鸥博士的这部论著，在文本解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助于学术同行的深入思考。对于《殷武》一诗，他认为文本所述祖先事迹的诗句，是从殷人传统的宗庙祭祀诗中撷取；而歌颂时王的部分，则明显带有西周晚期的特征，是当时所作，篇章结构带有旧作新篇组合的痕迹。对于庙堂歌诗不是把它看作一成不变，而是认为它可能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损益，同一篇作品的生成会跨越漫长的年代。这种推论至少在道理上是成立的。即以乐府诗为例，同一题目和内容的作品，汉代乐府古辞和晋乐所用的诗句往往差异甚大，有的已经改得面目全非。既然后代乐府诗在演唱时存在文本改变的情况，为什么《商颂》不存在这种可能呢？作者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同时又用事实加以证明，为解读三《颂》一类的作品文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有助于解开某些学术之迷。再如对于三象的训释考据，他没有沿袭旧注，把象解释为动物界的大象；也没有把三象重译的传说和《周颂》硬行对接，把象解释成翻译人员。上述两种解释在文字上有根据，又不难找到相关历史记载来附会。在对三象的训解上，小鸥博士选择了另一条艰

难的道路，他从考察周族祖先崇拜的重点对象入手，探寻三象的真正内涵，最后认定，所谓的象，乃是法象、仪范之义，三象是周人为歌颂三位英雄祖先所作的颂诗。这样一来，三象就真正有了着落，并进而确定《天作》是三象的首篇歌诗。关于三象所属歌诗，历来猜测之词较多，一直没有定论。小鸥博士对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研究中独辟蹊径，提出的看法富有启示性，可以说是运用原生态把握方式过程中的一个飞跃。

小鸥博士的这部论著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但往往是以浓缩形态出现，未能全方位展开。如果能进一步加以扩展，还会有许多新的建树。书中对于“成”作为音乐术语出现时的具体含义，所作的解释就非常精彩：“指某一完整的乐的组合的演出完成。将该组乐演出一遍，称为一成，数遍即称数成。”“每成即每遍的演奏间都有某种变化，这可能包括变奏等曲调上的变化，也表现在配器方面。”文中还把同是作为音乐术语运用的“终”和“成”区别开来，指出“备”与“成”的关联与不同。应该说，小鸥博士对于音乐术语“成”的解释已经相当到位了，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澄清了许多误解。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拓展，那么，不但上述结论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而且还能发现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因素。成，除了是音乐术语外，有时还用于计算土地，是表示面积的单位。《左传·哀公元年》称，少康失国，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建邑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成”用作计量土地的单位时，具有初具规模、相对独立之义，和充当音乐术语的内涵有相通的地方。《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古文成，从午。”“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戊是六甲五龙相纠缠之象，含复杂多变的意蕴。至于六甲五龙的具体所指，段玉裁注甚详，兹不赘述。成，古文从午。《说文》：“午，铎也。五月阴气铎逆阳，冒地而出也。”纵横交错称为午，先秦典籍可以见

到这类用法，因此，午又被说成是阴阳交合之象，亦有动荡之义。成，从戊，古文从午，戊、午都有纠缠错杂、动荡多变之义。成，当它用作音乐术语时，表示具有复杂结构和动态运作的——一个基本单位，具有五音繁会之义，是较完整的乐章，和它的原始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再把“成”字的考释和《楚辞·九歌》的具体表演情况相联系，无疑会有更大的突破。小鸥博士既然已经对于作为音乐术语的“成”给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扩展已有成果并不难，他完全可以作好。从礼乐文化角度观照三《颂》，是一种文化学研究方法，跨越多个学科，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小鸥博士撰写此书的初衷，是通过把三《颂》与礼乐文化相通，发掘《诗经》这部分作品的文学价值，归宿是在文学。三《颂》是庙堂歌诗，是礼乐文化的显现，因此，只有从礼乐文化切入才能真正揭示作品的意蕴内涵和艺术特征。那么，礼乐文化熏陶下的祭祀诗有哪些特征呢？尤其是在艺术方面，有哪些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地方呢？对此，礼书中有许多论述可供参考。《礼记·少仪》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这里提到的各种场合的美，是浸润着礼乐文化精神的理想美，如果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是各种威仪之美。小鸥博士的这部专著对于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已经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果能从礼乐精神的艺术显现方面进一步开拓，将会有更多的发现。《礼记·记器》把礼的形式分为多、大、高、文和少、小、下、素两类，并且写道：“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三《颂》作为祭祀歌诗，少、小、下、素类型居多，但也不乏多、大、高、文的场面。倘若能从礼仪形式对比中去透视人的道德追求和审美风尚，从人的主体性方面去审视艺术表现上的特点，这部专著会锦上添花，变得更加充实厚重。

小鸥博士的这部专著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增益修订而成，从

动笔到最后成书，历经十年时间。在此期间，历尽坎坷，备尝艰辛，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一再延缓此书的进度，此中甘苦，本人备知。我和小鸥博士有同门之谊，论文写作期间即有切磋交流，亲眼目睹他在突破难点时的拼搏与喜悦。论文写成之后，又因近水楼台之故，遂得先睹为快。今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作为这部专著的早期读者，感到十分高兴，向他表示祝贺。

小鸥博士天资聪颖，悟性极强，又有扎实的功底，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优越条件。对于小鸥博士来说，进一步的发展所缺少的不是智慧、才华，而是时间；缺少的不是在学术上的热情，而是如何掌握好节奏。小鸥博士正当英年，正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如能静心澄怀，持之以恒，前程不可限量。既然这部专著已经具备坚实的理论支点和深入的故实考据，那么，在此基础上建构体大思精的力作，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相信小鸥博士一定会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把已经绘制的蓝图变为层出不穷的论著推出。

以上所述，未必得当，姑妄言之，仅供参考。

2000年1月于长春

自序

王国维先生曾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并说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王氏为20世纪中国学术之巨擘，由王氏此言，可以想见《诗经》研究的难度。《诗经》中的每一篇都存在着难解的学术疑点，其中最为难读的又是三《颂》。三《颂》难读，然又不可不读，因为它们不但是现存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而且是解读《诗经》本身的重要关键。《观堂集林》收录王国维氏有关《诗经》的论文六篇，其中《释乐次》与《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讨论周代礼乐之用和礼乐史的问题，其余四篇即《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上、下）》，全部是研究《颂》诗的作品。以王氏之学术境界与治学门径，在《颂》诗的研究中倾注如此精力，可以想见它的重要。

数十年来三《颂》研究的基本状况却不如人意，就笔者孤陋所及，60年代，《中华文史论丛》刊登之《周颂考释》，乃高亨先生40年代旧稿，除此以外，仅有零星论著涉及《颂》诗的若干问题。学者中能倾注全力研究三《颂》者寥若晨星。究其原因，除《颂》诗本身不易解读外，尚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学术背景。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变革中断了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的传承秩序，但历史又没有及时给包括《诗经》研究

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提供顺利转型的条件。清末以降的疑古思潮，助长了中国学术与当代政治变革的纠葛交缠，严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使学术自身受到严重的牵累。在社会发展到足以消化西方传来的近代思想方法时，其他因素又使学术人格的独立一度受到严重的侵害。民族文化传统对国家利益和当代民族文化影响的深层意义终于被较多揭示出来时，学术史意义上的学术断层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所谓学术史意义上的学术断层，不是通常所说学术研究群体年龄落差较大的问题，而是指整个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前代学术大师们以西方近代学术规范为蓝本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至今仍在支配着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以乐府文学研究为例，梁启超、罗根泽等人所确定的乐府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围，至今仍然在限制着汉乐府研究者们的基本思路。到目前为止，文学史界一般都还将“乐府文学”的概念局限在“乐府诗”的狭小圈子里，没有认识到所谓“乐府文学”应即“乐府”所涉及的诸综合艺术形态的文学因素，它至少应该包括诗歌、赋体文学、戏剧文学、诸隐文学等文学样式。实际上，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小说乃至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皆为其所从出。学术发展的滞后现象，使汉代乐府文学繁荣兴盛的历史事实与当今文学史著作中它所表现出来的薄弱境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从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学术界对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形态基本特征的错误认识。

礼乐文化是中国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既在艺术思维观照中的各个学科分支上高度发达，又保持了原始艺术的生命存在方式，即诸艺术因素、艺术分支之间，艺术与整个社会生活之间乃至艺术、人生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所谓天地之文，“惟人參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文心雕龙·原道》）反映了直到六朝时期，人们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尚有认同。然而近代以来，关于“乐”的重要感性显现形式——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态，学界一般人士在较为表浅的意义上似有闻知，但多数人对它的前述本质特征实际并无深刻的认识。反映到《诗经》研究方面，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对《诗经》文学价值与文学特征的理解虽然往往与古代社会生活实际严重隔膜而不得要领，在整个20世纪却甚得文学研究界的青睐。以上情况造成人们对《诗经》文学价值认知判断的严重偏差。80年代初，笔者在选择《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作为硕士论文题目时，开题报告就因为与前述理念的冲突而难以通过。幸赖先师华钟彦教授全力支持，笔者才得以走上通往今天的研究道路。抚今思昔，令人不胜感慨！

选择三《颂》作为研究对象，比选择二《雅》更富于挑战性。然而不索何获！只要深入其间，即使在通行文学史教材的理论框架内剔抉三《颂》诸篇所容涵的文学意味，也能有所得。本书关于《商颂》基本美学特征与时代审美风尚关系的论述，关于《周颂》篇章结构与名篇特点的分析，关于《鲁颂·有駟》与“成相杂辞”艺术形式的异同流变等方面的探讨，都可归入此类。但本书的重点是将《诗经》置于先秦礼乐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察，是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学肇始阶段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并由此探讨中华民族心灵史的一个侧面。这些都可以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得以窥见。

皓首穷经是常带揶揄之意的典故，《诗经》这样的研究对象提供给我们的试卷，确实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圆满完成。尽管本书的撰写及其前期工作耗去了笔者十数年的大好年华，已经完成的这部书稿也还有需要更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然而作为近代学术史

上第一部对《诗经》三《颂》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专著，它的发表不但是笔者本人半生的学术总结，同时至少也能给后来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对象，从这方面来看，也应该说对学术史有所贡献。

先师华钟彦、杨公骥两教授生前曾在学术上对笔者寄予很大的期望，而笔者这份答卷则显然是不合格的，它只能是警策本人的一个信号，督促笔者在人生与学术方面继续自己终生不倦的探索。

目 录

序一	夏传才 (1)
序二	李炳海 (1)
自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商颂》与殷周两代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6)
第一节 关于《商颂》作年的论争及初步结论	(6)
第二节 《商颂》五篇的分类与作年	(21)
第三节 《商颂》的文化性质及其与周文化的关系	(32)
第二章 《周颂·大武乐章》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	(45)
第一节 《大武乐章》的作年与篇章归属	(45)
第二节 早期周礼的文化特征与《大武乐章》 的思想内涵	(70)
第三节 《大武乐章》的艺术构成及其文化意义	(82)
第三章 《周颂·三象》与周代礼乐文化的演变	(90)
第一节 《三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命名原则	(90)
第二节 《三象》之诗的篇目及其思想内涵	(102)
第三节 《三象》舞容与周代礼乐文化的演变	(108)
第四章 《周颂》农事诗与周代礼乐制度	(120)
第一节 《载芣》与周代籍礼	(120)
第二节 《良耜》与《周颂》中的祭祀文化传承	(136)